

《世界如此危机》连载(十二)

■ 高连奎 / 文

知识界为何劣币驱逐良币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的普遍知识水平低下,我们可以用经济学者的“信息不完全”理论进行解释, 二十世纪经济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再迷信市场, 正视了市场失灵,这使得得经济学更能解释现实,其中对信息的研究尤显重要。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市场的交易是充分自由不需要任何运行费用的, 就好像物理学家研究无摩擦的世界一样。但这不是现实世界的状况而是想象中的世界, 在解释经济现象时难免不真实和漏洞百出, 很多理论经济学家陶醉在这种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中。

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兴起,市场交易成本的概念被提出, 施蒂格勒研究了搜寻信息的行为、阿罗专门出版了信息经济学文集;尤其是到了 70 年代,研究信息经济学的文章大量发表。这些信息经济学家使人们认识到真实世界中的市场信息不可能完全、在不完全信息状况下会出现什么行为以及任何克服信息不对称。2001 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的行为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1996 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

而之所以出现信息不完全,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知识分工的存在, 劳动分工问题就一直是论者们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但是知识分工问题却被完全忽略了,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 每个人只知道社会很少的知识,行为主体之间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有了知识分工, 各个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信息。

由于知识分工, 现在的学科之间的划分越来越细, 这明显不利于认识和解释社会, 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如果只从自己专业角度看世界, 难免出现偏见, 这也是社会上谬论横出的原因所在, “专家”一词的贬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我们还要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区别。“如果一个化学家或一个生理学家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化学家或生理学家而决定放弃接受综合教育并集中精力研究他自己的专题, 那么他的这项决定便完全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是社科科学家, 那种专注于一个专业的做法都会产生一种特别有害的后果, 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偏见, 而且会侵蚀我们在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能力

在古代, 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 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 把自己束缚在里面。这就是所谓专业化的尴尬, 经济学本身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亚当·斯密、密尔、李嘉图、马克思、马歇尔等等, 当都不仅仅只是经济学家。然而,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却分得越来越细了, 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政策主张就形成不同的流派。

其实现在这种问题并没得到社会的重视, 很多知识很少的人却大力推广自己的一孔之见, 而且是知识越少越偏激, 而越偏激的言论越容易在舆论界胜出。而那些知识丰富的人反而谦虚不语, 时间长了, 社会上充斥的几乎都是偏激的言论, 也就是出现了知识界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在中国三类经济学家最出名

另外, 出名的经济学家并非最好的经济学家, 前些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詹小洪研究员, 曾经写过一篇《京城十类经济学家》的文章, 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十类: 分别是, 决策经济学家, 会议经济学家, 方案经济学家, 讲坛经济学家, 课题经济学家, 绿卡经济学家, 公司经济学家, 民间经济学家, 诸侯经济学家十类。

但是以现在的观念来看, 笔者认为应该将“基金会经济学家”、“投行经济学家”和“商学院教授”和“报章经济学家单独出来。中国的经济学家非常多, 但最活跃的无非是这几类, 而且都是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 基金会经济学家向着美国说话, 投行经济学家总是在关键时刻说些与趋势相反的话, 商学院教授很多都成了地产商的代言人, 报章经济学家多是记者、编辑出身, 喜欢煽动民粹, 毫无专业性可言。

尽管这几类人占的比例并不高, 但是他们都乐于推销自己的观点, 媒体充斥着的主要是他们的观点, 目前风头最劲, 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 在外人眼里, 他们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代表, 而中国经济学家的

社会印象也长期被这三类经济学家代表着。

中国经济学家口碑不好的其他因素

另外中国经济学家口碑不好, 除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之外, 也有一些技术性因素。

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都来自于“即兴回答”, 很多经济问题属于“预测型”的, 比如通货膨胀是否继续? 欧元是否会崩盘的? 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这都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具体的研究才能确定, 几乎没有问题是只靠专业知识就能回答的。经济学问题是不适合即兴回答的。都需要思考后再回答, 但是很多场合不回答记者的问题也不合适。中国很多学者说法其实都来自于这种即兴采访。

其次, 另外很多财经问题需要专业知识的铺垫, 不是一下就能讲清楚, 而且记者的每个问题都代表一个角度, 不是每个角度被采访学者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当然也有给学者挖坑的, 这主要是少数不良记者, 不是主流, 大多数记者都对自己采访的学者非常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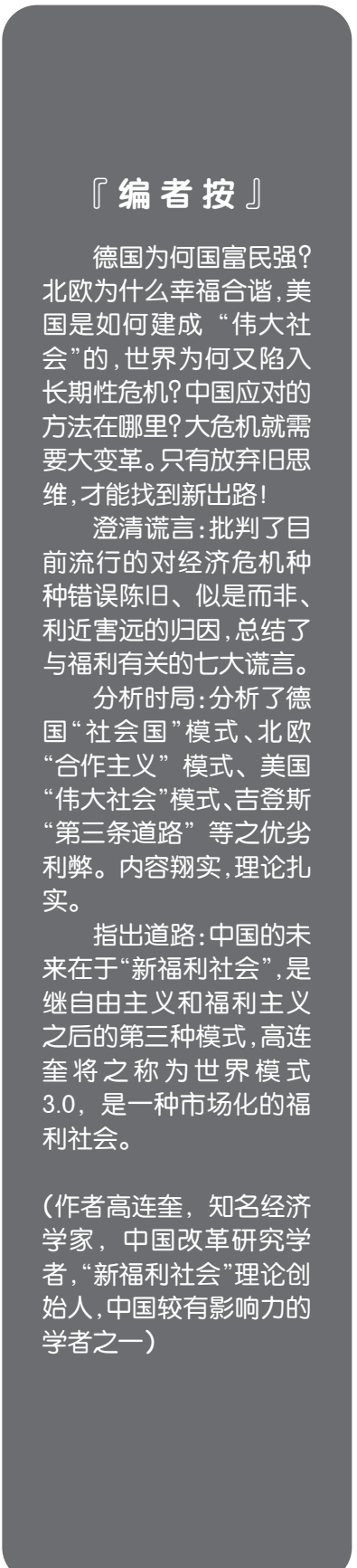
第三, 即使是邮件采访, 其实给学者的思考时间也非常少, 比如三四个问题, 至少需要 20 分钟的时间, 而且很多记者的采访都是新闻话题, 里面学者要了解当时的新闻背景, 但是即使是经济学家, 也不可能整天看财经新闻, 而且财经新闻太多了, 不是每个都能注意到, 如果不看财经新闻这些问题就回答不准确, 因此就可能出现错误。但记者要的都比较急, 比如上午给问题, 下午就要答复, 或是下午给问题, 晚上就要答复, 这时间都非常紧张。不利于学者进行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是先将问题进行答复, 不耽误记者写稿, 然后我想到了新的情况, 再将新的想法补充给记者。其实这些采访对学者来说都是义务性的, 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而且名学者每天都会面临非常多的这种采访。以每个采访时 30 分钟计算, 其实也是不少的时间, 况且大家都非常忙。当然记者的采访可以让学者扩大知名度, 这也算是对学者的报酬了, 但是这样的报酬对很多大牌学者却没有什麼吸引力。

第四, 中国很多财经记者, 确切说不是很多, 应该是几乎全部的财经记者都没有经历过系统的财经学习, 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专业出身, 因此他们在处理经济采访时, 不是从经济专业角度出发, 而是从民粹主义出发, 从新闻的轰动效应出发, 这也是很大一个因素。很多问题必须进行专业分析, 比如外汇储备问题, 炒作了那么多年, 但民众仍然一头雾水, 关键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并不符合民众的感官需要, 因为这样的真相媒体就不乐于报道, 因为民众就很难知道真相, 比如媒体喜欢报道涨价, 不喜欢报道降价, 除非是暴跌, 媒体喜欢货币超发, 而对于那些客观分析的则不喜欢报道, 民众需要的正确的, 专业的, 而不仅仅是危言耸听。

第五, 很多记者总喜欢采访当官的, 比如北大、清华中国经济中心的主任, 某经济学院系的院长, 或是社科院等相关研究所的负责人等, 但是当官的的不一定学术水平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记者采访的问题不一定是此人的专业, 经济学是分很多专业的, 比如在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就很多经济学家不在行, 比如比如现在很多人喜欢采访北大中国经济中心的主任姚洋, 但是姚洋是研究农业经济学的, 其他的都不在行, 但是很少见到记者针对农业问题采访他, 几乎都是农业之外的问题。

第六, 当然这些问题主要责任在学者, 中国学者总体水平比较差也是根本原因, 中国学者除了专业书籍之外, 很多说法其实就是来自于媒体, 也就是学者跟着媒体学, 特别是对新闻事件的分析, 而媒体又引用学者观点, 来回反复的引用, 而媒体的来源基本上都是外电报道, 财经领域的报道很多都是来自于外电。因此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其实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说法的“山寨版”, 这一点都不足为奇。

第七、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盲目追随西方, 而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 不仅跟着西方唱衰中国, 而且总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 不自觉中充当了免费的“经济杀手”。实践证明用西方经济范式分析中国问题的基本上都错了, 因为人家所处的经济阶段跟我们不一样, 总是照搬人家的说法肯定不行, 其实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错误, 而是中国学者不知道“活学活用”所致。目前这些人有跟中国的右翼民粹主义结合的趋势, 有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 他们的危害将比以往更大, 而右翼民粹主义主要是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不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 北欧为什么幸福和谐, 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 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 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 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 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 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 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 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 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 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 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 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 3.0, 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 知名经济学家, 中国改革研究学者, “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 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者, 而厉以宁突然将自己的思想转向了哈耶克的对手缪尔达尔, 这怎么不让人吃惊呢, 厉以宁在演讲中大力推崇缪尔达尔提倡建设保障房的主张。

而之前的厉以宁决对不是这个样子, 以前的厉以宁认为“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 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 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同时期秋风也是近年左转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甚至江湖谣传秋风已经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哈耶克协会开除, 见到秋风时, 笔者称赞秋风是“当代中国的严复”, 笔者问秋风对严复有没有研究时, 秋风表示研究很少, 笔者就讲了两人的相同之处: 秋风与严复的思想经历极其相似, 都是早年通过翻译思想书籍, 最早接触、传播新思想, 然后成为思想领袖, 但最后又趋于理性和保守, 最终回归儒家传统, 秋风表示自己要认真研究下严复, 我们相信秋风没有研究过严复, 但秋风和严复在不同的时代走上相同的道路, 这里面既有相同的思想成熟逻辑, 也有类似的时代背景。只不过严复为中国引入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而秋风为中国引人的是哈耶克主义, 前者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灾难, 后者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经济和民生问题。

后来笔者又问秋风, 现在是否还信奉哈耶克, 他说仍然信奉, 但补充了一句, 世人对哈耶克误解比较多, 其实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其现在流行的哈耶克主义并非真正的哈耶克主义, 笔者听后补充到, 确实是这样, 现在很多理论都被简化了, 一简化就走形了, 笔者举例, 伯南克是货币学派, 但很多人将伯南克当成凯恩斯学派进行批判, 这是典型的无知。

其实科斯、哈耶克都是肯定政府的作用的, 比如哈耶克一直强调政府对自由的保护作用, 没有的政府的保护, 公众不可能有自由, 而科斯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这些理论都非常清楚, 而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者, 却将他们的理论者减缩成了小政府主义, 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

认识一个学派, 我们既要知道他们的理论基础, 也要了解他们的主张, 他们的主张是由他们的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 因此了解他们的理论基础比了解他们的经济主张更重要。现在人们只是了解他们的主张, 而不管理论基础, 肯定错误百出。当代中国人只了解几个时髦的人物, 一说就是谁主张什么, 谁不主张什么, 但为什么要这样, 没人去探究。即使是爱看书的人, 也只是看几本历史上的畅销书, 而不研究学术发展的体系与脉络。中国学者很多时候表现的毫无良知, 其实背后跟这种思想体系的不完整有很大关系。

中国学者为何热捧哈耶克主义

哈耶克的一生的悖论很多, 他终生反对社会主义, 但他的经济学思想却是来源于马克思; 他一生反动道德与社会正义, 而他却曾是芝加哥大学的道德学教授; 他三十多年不研究经济学之后, 却获得了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反动福利社会, 但却因为芝加哥大学给的退休金太低而辞职; 他的成长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养, 而他却一直为融入英美主流社会而努力。

哈耶克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了三个专业, 分别是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 这三个专业也影响了人的一生, 他早期研究经济学, 后半生研究法律, 但贯穿他始终的是心理学, 他的每个著作都散发着心理学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个移民在异国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哈耶克出生在奥匈帝国, 在面积上这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 在人口上, 也仅次于俄罗斯及德意志, 是第三大国。但他在英国待的时间最长。

他进入英国时, 凯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经济学家, 而哈耶克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小子。

哈耶克进入英国后, 一边利用通信的方式与凯恩斯交流学术观点, 希望得到凯恩斯的提携, 另一方面却写文章攻击凯恩斯。针对哈耶克对自己的攻击, 凯恩斯认为: 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假如他确实有善意, 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 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 有一种激情驱使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 但我搞不明白, 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

其实哈耶克挑战凯恩斯? 部分原因可能在于, 他认识到通过挑战凯恩斯, 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 而后人认为当时的哈耶克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后人总喜欢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段交往称为“论战”,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知名学者对学术青年的答疑解惑而已, 虽然哈耶克充满恶意, 但凯恩斯却显示出了一个长者的风度, 对来自哈耶克的每封来信都进行了耐心的回

复。

其实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评价甚低, 凯恩斯认为“哈耶克的经济学家代表作《价格与生产》是他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 从第 4 5 页往后, 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他的书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 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凯恩斯在哈耶克 1 9 3 2 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 “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其实对哈耶克评价很低的不仅仅是凯恩斯, 就连他非常好的朋友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也说: “我不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看法也基本上代表了专业经济学界对哈耶克经济思想的评价。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其实来源于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演绎, 毕竟在当时的德语世界, 马克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 哈耶克就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课。这对哈耶克影响很大, 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 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 哈耶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 更接近于马克思, 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 “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 - 收缩构成的, 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 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 马克思认识到了, “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他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 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 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 “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 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 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也曾提到过马克思这一思想, 他说: “1 9 世纪上半叶, 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 ‘虚拟资本’是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 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 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 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 最后, 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非常客观地讲, 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干扰,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 也并没有将其看做是经济危机最主要的根源, 这里面当然因为马克思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而对那些枝节性的东西不那么在意, 而更实事求是地讲,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比佛利德曼的理论要准确, 哈耶克强调的是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 而佛利德曼强调的是货币数量, 两相对比, 显然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 但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也很少提及哈耶克这一点, 其实在中国也没有人真懂哈耶克, 他们对哈耶克主义的阐释错漏百出。

除了攻击当时的学术权威凯恩斯外, 哈耶克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也开始从其他渠道入手, 1 9 3 3 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 哈耶克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 他这样做其实是想帮助英国政府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 但被拒绝了。但不久到来的二战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 战争帮助哈耶克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 “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 “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的生活”, “我虽然是奥地利人, 但在战争状态下, 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

1 9 4 4 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本通过妖魔化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向资本主义献媚的书, 在这之前, 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 他开始有了一些名气。《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 继而在美国出版, 但是找了三家出版社均遭到拒绝, 出版社拒绝出版本书, 是因为书里面充满了政治偏见, 而且这种偏见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他们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 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其实这本书也不适合正人君子阅读。

(待续)